

流量社会背景下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逻辑理路

梁杰 曾骏 黄斌军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流量社会是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迅速崛起的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在流量社会下，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需构建“流量生产介入—流量分发助力—流量社会引源”三维框架，并深入洞悉其蕴含的逻辑机理。其中，在流量生产端，高职思政教育场域的亲和力建构，首要在于把握流量生产规律，要求高职思政课教师要精准锚定学生需求、精准实现内容生产，实现融技于情；在流量分发端，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建构需深度解密学生的圈层文化，在“入圈”的基础上聚焦“成圈”，在聚焦“成圈”的过程中构建共情初始流量池，并通过“破壁”精准触达学生“目标圈”，实现融形于情；在流量引源端，则依托“场景化叙事—正能量价值锚定”策略，在符号消费洪流中构筑意义共享空间，实现引源入情。三者协同赋能，方能破解高职思政课“曲高和寡”困境，实现价值观传递与情感共鸣的深度统一。

关键词：流量生产；流量分发；流量引源；共情力；亲和力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流量绝非浅层的数字喧嚣，其意指社会公众注意力的汇聚与流向。随着媒介与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以流量获得和转化为表征的网络资源分配方式与竞争方式正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社会大众的信息接受范式与关系缔结范式，万物互联的共享平台则使个体的生活轨迹、消费习惯乃至情感表达都深深烙印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印痕。由此，一种网络社会演进中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流量社会”逐渐成形^[1]。流量社会是网络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技术实践，而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向着社会的全面转型迈进。在流量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其融合了信息主义与消费主义，重塑了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逻辑，形成了以共情为纽带的认知连接模式，并深刻影响了思政教育环境。据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4年网民规模已有11.08亿人”^[2]。因此，流量社会背景下，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网络群体的注意力，谁便能成为流量的获得者。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主渠道，高职思政课教师需要处理好流量时代课堂共情力与亲和力的逻辑关系：一方面，高职思政课教师需要破解高职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困境。高职学生注意力的流向很

大程度上与其讲课内容是否共情息息相关，而内容是否共情以及如何共情则与高职思政课教师是否具备亲和力有莫大关联；另一方面，高职思政课教师需要适应学生的语言接受形式。“流量为王”促使高职学生渐进式的成为流量热点的裹挟者与共情者，对这类网红现象及“流量至上”价值准则的解读与探讨既是高职思政课教师展现课堂亲和力的一种体现，同时也蕴含着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逻辑机理。

一、流量生产介入：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流量逻辑

在流量社会下，“流量”一词褪去了指代技术术语的狭义释义，并成为推动社会转型以及重构注意力资源的重要力量，其内核蕴藏着一种重塑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以及教育实践的新型逻辑。高职思政教育场域的亲和力建构，首要在于把握流量生产规律，而共情力（Empathy）作为连接认知与情感的桥梁，正是精准锚定学生需求、精准实现内容生产的核心引擎。

（一）认知介入：精准锚定学生需求的共情导向

在Web1.0时代，门户类和搜索类网站开始介入受众注意力市场，并凭借其信息链接优势成为新的流量中心。到了Web2.0时代，社交媒体和移动智联的普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24年度项目：流量社会背景下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SZZX24082。

作者简介：梁杰（1995—），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曾骏（1981—），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黄斌军（1996—），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及助推了“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平台型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和端口特征的技术物（如微博、微信、抖音等）”^[3]的崛起。与此同时，“无处不在的网络化生存和无孔不入的符号化消费在万物互联时代”实现了人、数据以及技术的深度融合，“构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逻辑——流量逻辑”^[4]。在此情境下，社会个体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情感共鸣与符号消费成为流量生产的核心动力。

高职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认同已深度嵌入流量社会的运行体系之中。从认知方式来看，高职学生作为“Z时代”的主力，

其认知的核心点是是否“与我有关”。这里的“我”指代基于圈层化、分众化的学生群体，是基于自身发展与自身利益衡量的“我”。在“与我有关”的主导下，信息的流动与流动的信息呈现接收碎片化的趋势，流量生产亦陷入信息过载与意义匮乏的泥沼；从情感结构与价值认同来看，网络热点事件的动态发酵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情感能量的聚合与释放，其生成机制遵循“触发—共振—裂变”的三阶段演化规律。作为深度参与信息生产与信息传播的一代，高职学生情感触发的关键词是“深有同感”，在“深有同感”的基础上流动的信息进入了专属这一群体的情感共鸣箱，达到了“共振”的阶段，并汇聚为一种圈层化的注意力资源。然而，当这一注意力资源以点赞、转发等形式实现量化传播时，流量则达到了“裂变”的阶段，并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职学生的自身情感形成与价值准则的塑造。因此，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建构必须从单向度的“理论灌输”转向多层次的“情感共鸣”。共情力的介入，则是实现教师与学生情感共鸣的关键。

美国心理学家亚瑟·乔拉米卡利曾在《共情力》一书中这样释义“共情”，“与同情心经常由即刻情绪所驱动不同，共情是一个人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响应。它的产生基础不是假设，而是事实。”^[5]在流量社会中，共情不仅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更是内容传播与情感动员的关键机制。对于高职思政课而言，流量逻辑下的思政共情力应具有三重功能：一是情感破冰功能。思政课新的生命力的形成依附于思政课教师的情感表达与情境营造，这是因为只有教师的共情力足够敏锐，才能逐步摆脱流量控制的泥潭，打破学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建立信任关系；二是认知共融功能。认知共融并非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将海量的信息进行解构，并从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形成契合高职学生具身体验的情感符号，促进学生对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三是行为引导功能。雅斯贝尔斯

曾形象地说，“教育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心灵唤醒另一个心灵。”^[6]思想政治教育共情力要求教师超越知识传递者角色，成为“情感翻译者”，通过情感共鸣激发高职学生的责任意识与行动意愿，实现“效其行”的教学目标。

（二）流量生产共情：数据赋能的精准内容生产

马尔库塞曾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筹划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7]。在海量信息深度触及人们思维空间的当下，“流量”不仅成为一种新的内容生产范式，还成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无法忽视的社会符号。它既是关注度的量化体现，更是影响力塑造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思政课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8]。在流量社会背景下，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增强需深度介入流量生产的数据端，从其生产载体、生产时间等方面挖掘流量生产的共情特性，实现融技于情。

其一，在生产载体层面，流量生产显现平台化的共情特性。互联网数字化平台是流量生产的重要聚合地，其不仅能精准分析用户的兴趣爱好，还能深度识别和预测用户的情感状态与需求。通过捕捉用户的情感信号（如停留时间、互动行为、表情识别），AI算法能够推送到更易引发个体共鸣的内容，实现情感定制，这使得共情内容的分发高度精准和高效。从现实观察来看，当社会热点事件通过算法推荐进入学生认知视野时，首先激活的是他们的视觉符号（如淄博烧烤热中的烟火气画面）或语言符号（如网络流行语“孔乙己的长衫”）引发的初级共情，这种共情具有瞬时性与浅表性特征。高职思政课要提升亲和力，就需要将流量平台引发的初步共情深化为具有价值认同属性的次级共情，并将热点事件的表层情感升华为价值讨论，实现流量热度的共情化教学转化。

其二，在生产时间层面，随着数字技术、大数据技术的深度介入，流量生产的时空结构发生了“加速化”转型，出现了时间热度上的“流量半衰期”。从现实观察来看，热点事件的“流量半衰期”是指网络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其流量（如关注度、参与度、传播量等）从峰值下降到低潮期所需的时间频率。对于高职思政课而言，“流量”已成高职思政课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元素。热点事件的“流量半衰期”规律促使高职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既要以流量热度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又要通过批判性思维或辩证思维解构流量生产的情感机制，生产出直抵人心的“共

情”体验,进而使动态发酵的流量热点真正转化为价值观培育的情感支点,实现内容优化与教学增效。

二、流量分发助力: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形塑逻辑

在数字化生存已成为常态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流量分发”成为信息传播的核心机制,其本质是精准连接,即精准洞察用户需求,实现信息找人。对于高职思政课而言,将流量分发思维与工具融入高职思政课亲和力建设,并非简单的技术嫁接或流量追逐,而是旨在通过精准、高效、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共情力嵌入圈层传播网络,从根本上重塑高职思政课的亲和力,实现入耳入脑入心的终极目标,其内在的形塑逻辑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成圈”:构筑高职思政的共情初始流量池

圈层是流量社会的基础组织单元,它的特殊性在于个体“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等凝聚纽带”^[9],而是以兴趣、身份认同聚集成圈,由此,圈层成为个体获得存在感、认同感的重要场域。在流量社会中,大学生群体不仅是网络圈层的重要塑造者,还是信息增值与流量分发的重要助推者。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圈、兴趣圈、社交圈与互联网高度融合在一起,“人以圈分”的现象在他们身上逐渐日常化。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建构需深度解密学生的圈层文化,在“入圈”的基础上聚焦“成圈”,在“成圈”之上构筑高职思政的共情初始流量池。

其一,在“入圈”的基础上聚焦“成圈”,专注高职思政的现实诉求。所谓“入圈”本质上是教育主体主动融入学生网络及现实社交圈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主体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出一个情感场并形成聚散效应,从而引起学生的情感反应。乔纳森·特纳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一书中曾谈到,“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在人际互动和群体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的社会承诺的背后力量”^[10]。对于高职思政课而言,“入圈”意味要分析学生的情感态度、引导学生的情感认知以及专注当下思政的现实诉求。因此,增强高职思政课的亲和力需以情感驱动为抓手,在“入圈”的基础上精准触及学生生活圈、兴趣圈、社交圈,实现情感导向的双向互动,在聚焦“成圈”的过程中了解学生所思所想,进而实现情境能量的正向波动。

其二,在“成圈”的基础上“入情”,构筑高职思政的“共情初始流量池”。柯林斯曾在《互动仪式链》中指出,“当个体在权力情境中受到支配或者被排除

在地位情境之外会产生消极的情感能量”^[11]。在传统的高职思政课堂中,由于传授者与参与者所处的地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参与者无法在共有的情境中获得主体性的发挥与体验,因而容易引发参与者的抵制情绪。“成圈”意味着思政课教师要主动给予学生参与流量热点与分享流量热点的机会,在流量分享的过程构建一个以价值观为内核、以情感为纽带的“共情初始流量池”。当然,这个“共情初始流量池”不是网络意义上的用户点赞集合,而是容纳课堂参与者思想认同、情感共鸣、价值共享的“心灵流量”的汇聚地。

(二)“破壁”:精准锚定“目标圈”实现共情穿透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曾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谈到,“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信领域”^[12],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接收者往往沉迷于自己所关注的信息内容,置身于这样的自适应空间可使其更容易获得精神慰藉和身心愉悦。然而,这也使信息接收者在无形中受限于信息所投掷的算法牢笼,为“信息茧房”的形成提供了生长的契机。作为网络世界的原住民,高职学生自然也是算法牢笼的主要成就者与供给者,对其“破壁”是跳出网络预设圈层的重要方式。需要强调的是,“破壁”不是硬生生地将学生剥离其已然适应的网络圈层,其旨在主动嵌入学生的圈层世界,为高职思政课实现精准滴灌创造条件。

其一是“姿态破壁”,高职思政课教师的角色要从“灵魂工程师”向“灵魂导游”转变。从古至今,教师的角色形象一直是教育学探究的核心话题。古代社会,师者承担传道授业解惑之职;工业时代,师者转变为知识传递流水线上的“宣讲者”。由此,在网络尚未真正触及人们的生活世界之前,教师的核心任务是将一套既定、封闭的知识体系,高效、准确地灌输给学生。但随着网络普及的形成,互联网使得知识不再成为稀缺资源,流量分发则使信息找人变成现实,以往无所不知的授业解惑者、“灵魂工程师”在搜索引擎与海量数据库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此时,若固守旧时的角色形象,则容易引发高职学生对思政课的疏离与抗拒。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3]流量时代,“姿态破壁”意味着高职思政课教师要以“灵魂导游”的形象出现。与“灵魂工程师”相比,“灵魂导游”以“同行者”、“圈内人”的形象出现,其注重探知学生的网络世界,期望在探寻学生网络世界的过程中与他们并肩而行。

在与学生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思政课教师扮演“平等中的首席”一角,其权威不是完全依赖于职位,而是源于与学生对话中的洞察力、引导力和亲和力。“平等中的首席”一角旨在以“同行者”视角引导学生在知识的迷宫中自己寻找出口,培养他们“带着走”的能力。简言之,这一角色的内核是平等、互动与赋能,其破解了旧角色“曲高和寡”的困境,既使思政课教师在海量信息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也使其在伴生成长的过程中深度嵌入学生的圈层世界。

其二是“平台破壁”,高职思政课堂要从“守株待兔”向“出海捕鱼”转型。随着数字原生代成为高职学生的主体,其信息获取、社会交往与价值构建的场域发生根本性转移。从现实观察来看,传统高职思政教育的主阵地集中于实体课堂与代表官方声音的微信公众号、校园网站、视频网站等平台。这一传统输送模式在过往的信息环境中起着核心作用。然而,在抓住热点就是抓住流量、抓住流量就是抓住收益的流量时代,高职学生群体的认知图景与意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算法推荐、圈层文化和流量领袖所塑造。B站、抖音等平台以其沉浸式体验、强互动性与去中心化的传播,构成了学生们的“数字生活空间”与“价值浸润场域”。因此,对其破壁的关键在于转变“守株待兔”的思路,在遵循目标平台运行逻辑的同时向“出海捕鱼”转型。“出海捕鱼”要求高职思政教育工作者主动离开舒适区,进入学生的“文化主场”,在对话与融合中重建思政教育的共情力和亲和力。其中,对话旨在实现思政议题生活化,即紧密结合高职学生关心的就业、恋爱、人际关系、网络热点等现实议题,在小红书、B站等平台以“种草日记”等形式将思政问题由抽象问题链向具体问题链迁移,使思政教育从“高堂讲章”变为“生活向导”;融合旨在实现线上线下的流量同频共振,即借鉴流量热点洞察方法,将技术(算法、分发)、内容(思政理论)、情感(共情力)三者高度融合,从而使思政教育的内容之形、方法之形、载体之形借助流量分发变得更为丰富、灵动,实现融形于情。

三、流量社会引源: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叙事逻辑

随着流量社会这一新的网络社会结构的形成,流量生产方式、流量分发思维逐渐成为自媒体平台与社会公众构建有效情感连接的重要手段,其所蕴含的叙事逻辑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识别系统、认知判断理念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关键在于实现与学生的叙事共情。具体来看,

叙事共情以流量引源为端口,以共情力为桥梁,依托“场景化叙事—正能量价值锚定”策略,最终实现“引源入情”。

(一) 场景化叙事——实现“流量引源”的情感连接端口

流量社会的首要法则是“注意力经济”。对于高职思政课而言,要实现课堂“引流”,必须首先创造一个能瞬间抓住其情感与注意力的“入口”,这一入口就是场景化叙事。

(1) 场景化叙事的第一重特性为“在场性”。在场叙事的魅力在于能够打破叙事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时空隔阂,让思政课教师置于事件发生的核心现场,并化身为用感官直接触摸事件的“亲历者”。这种叙事的优势在于绕过了抽象的概括与转述,转而诉诸于生动的故事细节,提供的是一种直接感官体验。

(2) 场景化叙事的第二重特性为“沉浸性”。沉浸叙事的特性在于将人与场景深度融合并实现高度专注的状态。在这一场域下,高职思政课教师以叙事者身份入局,并将高职学生放置于特定的感官场域,使其视觉、听觉皆受叙事的节奏而影响,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达到沟通心灵、启迪心智。

(3) 场景化叙事的第三重特性为“交互性”。交互叙事借鉴了电影中的蒙太奇理论与传播学中的媒介传播理论,并将流量的运行特性与数字技术、信息的编辑规律以及情绪的唤醒节点实现了有机结合,让信息接收者参与到流量叙事的构建和发展中来,使叙事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线性结构。这一叙事旨在改变硬性灌输的授课思维,让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操作、选择、决策等方式推动课堂发展,解决思政内容悬浮问题。

(4) 流量社会背景下场景化叙事还需适应网络流量主导下形成的“碎片叙事”、“智能化叙事”原则。这一叙事旨在引导思政叙事者扬弃传统意识形态理性化叙事的生硬逻辑,在紧抓流量热点的同时向算法推荐的“感性化”叙事转场。但需注意的是,算法推荐的“感性化叙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算法推荐引导思政课教师把稳流量热点之脉,不仅利于高职思政课精准滴灌的实现,还强化了高职思政课在场叙事、沉浸叙事、交互叙事的稳固性;另一方面,流量至上触发了一些醉心于吞咽流量红利的算法获利者,这类媒体或大微号以吸引流量为直接目的,将流量引上道德失序的边缘。例如,为博流量,近年以来《信息日报》虚假报道流浪汉因拆迁变富翁、《亳州晚报》虚假刊发“女子为救人被狗咬伤”、《新安晚报》虚假刊发《安

徽小伙车祸后倒地无人理打 120 自救》与《我的右肾去哪儿了》、百万粉丝网红自编自导“自杀”等事件严重冲击网民的价值观底线。因此,思政课教师在流量引源的同时需关注流量推荐的授课合理性,流量热点的场景化叙事应以正能量价值锚定为基准,帮助学生在流量的茧房里辨别是非、澄清谬误。

(二) 正能量价值锚定——完成“引源入情”的价值升华

当场景化叙事成功引源之后,将学生的短暂注意力转化为较为稳固的情感连接、将流量红利转为留量红利则成为巩固高职思政课“共情力”的核心议题。而对这一议题的处理,需在场景化叙事的基础上实现流量引源的正能量价值锚定。流量社会下高职思政课正能量价值锚定需立足于三个层面:

一是引理论之源,入信仰之情,实现流量社会下高职思政课的认知认同。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曾提出,“任何交流都表现为高语境、低语境或中语境”^[14]。流量时代,不同的流量语境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算法所锚定的内容各有侧重。在高语境的流量叙事中,流量传播者所传递的信息含蓄而内隐,其视频信息或推文内容往往有着文化门槛,如董宇辉、赵健的读书日记、意公子、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等流量大微,其要求倾听者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背景文化知识,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流量传播者。显然,这类流量语境与部分高职学生所注意的文化内容或侧重点有着认知上差距。以此推之,中语境、低语境流量传播或许更能满足当下高职生的认知需要。因此,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形成需从思政课程的宏大叙事范式向高职学生较易接纳的流量中语境、低语境传播范式转移,在日常化叙事、生活化传递的过程将思政理论浅显易懂的方法论融入高职学生的专业发展、未来职业、现实生活之中,引导学生从“听讲者”变为“思考者”和“发现者”,在主动探究中理解理论背后的逻辑力量和真理魅力,奠定理性信仰的基石。

二是引时代之源,入担当之情,实现流量社会下高职思政课的情感认同。流量时代,人的注意力逐渐囿于流量热点的个体化叙事当中,流量制造者的时代动机、偶然举措皆有可能在某个瞬间成为网络流量的拥趸者。例如,2025 年鸡排哥的爆火就源于他的共情性和亲和性,鸡排哥的经典语录“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他的”、“请把你的塑料袋打开”、“不炸到位不原谅自己”等具有时代担当的口语化语境被网友称之为“最有原则的鸡排主理人”。鸡排哥的共情式话语具有典型的底层式流量领袖的时代品格,蕴含着高职思政课实现

情感认同的时代逻辑。因此,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建构应学习其独特的知己式、贴心式的语言风格,将正能量的“大道理”转化为内心的“真情感”。

三是引实践之源,入力行之情,实现流量社会下高职思政课的行为认同。吉杜·克里希那穆提认为,“教育不仅是获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让智慧觉醒”^[15]。那么,智慧该如何觉醒呢?马克思曾谈到,“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6]。流量时代,学生的思维空间更多地被流量热点等碎片化的虚拟物所影响,其看问题的视角或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受制于算法空间的束缚。因此,高职思政课亲和力的建设必须打破算法叙事的藩篱,入力行之情,既让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正能量的价值与力量,也让学生在流量信息的海洋里明心见性。

四、结语

流量社会作为一种成长于网络社会中的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其所蕴含的流量逻辑、形塑逻辑、叙事逻辑隐藏着叩开高职学生注意力的大门,为构建“共情型思政”提供了新的场域。着眼未来,流量社会背景下以共情力增强高职思政课亲和力需要从流量生产介入、流量分发助力和流量社会引源三个维度构建完整的逻辑机理。唯有如此,方能在注意力争夺战中赢得青年,并为高职思政课在数据共情、圈层嵌入、意义锚定等方面增添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张瑜,石秋怡.流量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43(3):36-46.
- [2]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J].传媒论坛,2025,8(2):121.
- [3] 杨江华,谢晓琳.从流量平台化到流量社会化——网络社会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变迁逻辑[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3):122-130.
- [4] 刘威,王碧晨.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J].浙江社会科学,2021(8):71-83+158-159.
- [5] [美]亚瑟·乔拉米卡利.共情力[M].耿沫,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 [6]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7]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8]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

-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001).
- [9] 郑欣, 朱沁怡. “人以圈居”: 青少年网络语言的圈层化传播研究 [J]. 新闻界, 2019(7):25-36.
- [10][美] 乔纳森. 人类情感: 社会学的理论 [M]. 孙俊才, 文军,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 [11][美] 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 [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2][美] 凯斯·R·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 [13]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N]. 人民日报, 2022-04-26(1).
- [14][美] 霍尔. 超越文化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5]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 教育即解放心灵 [M]. 张春城, 唐超权,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